



「天下秩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地区秩序，它在历史上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行之有效。

李扬帆 主编

被误读的

Bei Wudu de
Tianxia Zhixu

天下秩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扬帆 主编

被误读的

Bei Wudu de
Tianxia Zhixu

天下秩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误读的天下秩序/李扬帆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1-26592-5

I. ①被… II. ①李…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7397号

- 书 名 被误读的天下秩序
Bei Wudu de Tianxia Zhixu
- 著作责任者 李扬帆 主编
- 责任编辑 张盈盈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592-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234千字
-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言

多年以前，我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吾侪当此艰难时势，所学不为所用，亦不合西学之潮。果欲为谋生计，可于学问之外另谋一他图，或经商，或实业，而切不可可以学问做谋生晋升之道，如此则害学术之根底，弊莫大焉。”出处已不可考，但是我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中国对外关系思想的研究不属于显学，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才是显学。这注定了我的寂寞。

并且，从学科分类上而言，我的研究既不会被主流国际政治和外交学认同，也不会被主流历史学所认同。但是，我仍然盘桓于心灵的故乡，那个最初吸引我走向学问研究的兴趣点：中国问题。

基本上，我把中国当成一个研究的对象，一个存在问题的对象。我并不关心这种研究是否具有现实价值，我只关心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从逻辑上而言，中国当代和未来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深深根植于传统世界观的崩溃和近世中国身份的迷失。因此，对中国近世身份认同和世界观的研究，会自然与当代和未来的重要问题产生内在的关联性。

所谓学问，只存在于无邪之思中。凡思有邪者，均非真学问。比如，世间有淫人，因而才有所谓淫书。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有

载：“《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¹比如，世间有邪人，因而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只讲霸权霸术的大恶人一个，其实现实主义思想的研究者本身并不必然是个恶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书也好，历史也罢，读者的品性是做出评判的关键。惜乎观者多为《皇帝的新装》中之看客，而少有那个直言无邪的小童。

历史研究是直言无邪的基础。但是说出历史真相仍然冒着一定的风险，比如误解。我当然害怕被误解。康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说：我不怕别人证明错误，但怕被人误解。于我心有戚戚焉。

近世中国那些事、那些人，因与现世相隔不远，故越发难以定论。难以定论的根源在于我们心中的邪气。比如对曾国藩君，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八个字——内修黄老，外示儒术，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开宗明义即强调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专门强调了道德不应该作为政治行为的标准。他认为：“政治家必须考虑国家利益，视其为多种权力中的一个。而大众的头脑，不了解政治家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多半关注的是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这类单纯的道德和法律原则。”²这有助于我们合理评价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行为。

依利益决定的权力的确是政治的核心，然而，中国问题仍然有其特殊性。近世中国面临的文化存续的问题是西方学者并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中体西用论是中国文化人最后的堡垒，李鸿章、张之洞摆脱不了这个宿命，陈寅恪也摆脱不了。当然，今日和往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纠结。原因即在于中国本是一个文化自足体。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并不在其民主革命，却在于对明清易代的遗留问题做出了完满的解答，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体制构建问题，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这是晚清对晚明作出的跨越时空的回应，是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孙中山在祭奠明太祖朱元璋时直呼“我高皇帝”“我太祖”。为反满为汉而忘记了朱元璋的专制和暴戾，是为辛亥革命的集体无意识。他们真的具有现代民主思想吗？换言之，他们真的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吗？

长期以来，居住在这块热土上的人折腾了几千年，几次建立了庞大的统一帝国，直至民国，我们的原乡却没有固定的国名，只有朝代名，这种现象很有魔幻味道。这么宏大的历史现象，我们又怎能漠视？

我曾站在虎门炮台的一排清兵营房前沉思，心想 170 年前的年轻海岸守备队员就从这个门出来，一出来就被炸死了，他们根本没有还击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炮弹打不着移动的英军舰船。当时清兵最大的八千斤大炮的射程封锁不了整个水道，而英军的炮比清军的炮打得更远更准。这个炮台的守军大概有一千多人，加上关天培，最后全都战死了。他们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回去见自己的家人。何其悲壮。

这种移情（empathy）式的在场感一直贯穿我对中国近世历史的研究。枯燥的文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我不避讳这样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

我假设自己介入历史，但又将历史作为客观的对象。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介入的旁观者”，萨特给他的评语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

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这话特别能准确表明我对自己的定位。现在知识界流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早在五十多年前阿隆在其耸人听闻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就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做出了解释，他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有三种态度可以选择。或者他们不关心公共事务，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态度愈来愈罕见，每个人都承受公民生活的负担和责任。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参加政治斗争，但有两种参与方式：一些人以教士的身份行动或声称以此身份行动，唯一的目的是捍卫神圣的价值；另一些人加入一个政党，接受由此导致的种种束缚。……为什么不准几个知识分子选择不偏不倚的观察员的角色呢？不管怎样，在学识之外，仍有自由选择的余地。”³

欧洲某些学者说我们传统上是没有知识分子的，是没有知识阶层的，因为中国传统上只有士大夫，对他们而言追求知识的前途就是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参与太少，而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参与，是参与太多的问题。两千多年与政治结盟，三十多年与经济为伍，啥时候有自己了！只有通过长期的不参与，或者在参与中长期保持旁观者的身份，才会有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这种不参与，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还惦记着权力，而是要明白，知识就是权力，对知识的追求，一大批人独立的、长期的对知识的追求，才能有知识阶层的诞生。人家说咱们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吧。

在教学中，我对学生常说：北大就是一个虚名，是一个你预先设定的虚名。你没必要为此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我现在很为同学们担心，担心的不是你每天上了多少网，准备开什么公司，担心的

是内心的纯净，内心对大智慧、大道的那种执着。

中国研究的本质是反思，反思就能接近大道。本书即是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的产物。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的一个成果，本书适合作为大学研究生教学参考书。在“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外交思想史研究”（硕士生课程）和“中国外交专题研究”（博士生课程）的教学中，我尝试着启发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然后形成了论文。这既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经过修改，最后形成了这本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作业。学生们的习作比较稚嫩，请原谅他们的稚嫩。实际上，在研究中国方面，我们都是学生。每章的具体著者见目录。

全书由李扬帆统稿。

是为序。

李扬帆

2015年1月15日

注释

1. [清] 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2. Hans Morgenthau and Kenneth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165.
3. 转引自李扬帆：《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
李扬帆 / 1
- 第二章 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演变 姚锦祥 / 34
- 第三章 中国近世外交思想的双重性：一个以硬、软实力架构
为基础的尝试性分析 李太龙 / 55
- 第四章 明清帝国身份构建与东亚国际关系 李扬帆 / 68
- 第五章 “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
李扬帆 / 108
- 第六章 清末民初革命者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认同 田田叶 / 144
- 第七章 中央帝国的焦虑——论王朝时期外部压力对中国身份
认同的建构作用 乌力吉 / 169
- 第八章 东方主义叙述范式与西方对东方认识的改变
张昕扬 / 190
- 第九章 儒家、道家及新儒家思想国际化的可能性
朱雅仪 / 213
- 第十章 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何种世界观？ 梁艺染 / 243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 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

李扬帆

► 导 读

尽管天下秩序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是一般的讨论仍然忽略了这个秩序在历史上具体而复杂的真实表现，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就是那么回事”。笔者在过去自己的研究以及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将天下秩序的讨论追溯到一个更为朴素的话题：天下秩序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吗？作者经过反思，认为中国传统天下秩序是一个被误读的“世界秩序”。从主体层面而言，传统中国王朝不能被称为帝国。从生成与演化角度而言，天下秩序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双重特征，它基于中国王朝的想象但最终演化成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从结构层次而言，天下秩序并非呈现完美的同心圆结构，内亚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构成对天下秩序的对抗性共建，海外朝贡国和中原王朝对其构成认同性共建。

“世界”本是一个佛教用语¹，“天下”是中华文化的惯用语。²二者在近代以来的混同使用反映了中国惧怕被排除在世界之外。将天下演化为世界，进而缩小为国家，乃是源自这样一种集体的焦虑：在巨变的天下中寻求国家身份认同。当天下观与现实世界不能吻合的时候，出于对事物的确定性的追求和安全的需要，中国渴望世界有一种合理的秩序。然而，自地理大发现至互联网高度发达的

今天，真正全球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并没有建立。³但这并不妨碍雄心勃勃的古代强国对整体世界秩序的形象。对世界秩序的形象通常发生在具有强大文明自信和力量自信的政治共同体身上。

毋庸讳言，中国历史学、哲学和国际政治学近几年兴起的关于“天下秩序”和“天下观”的讨论源自“中国崛起”的现实及其政策需要。检索数十篇关于“天下秩序”“天下观”的讨论⁴，可以发现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是一个建立在礼仪秩序之上、崇尚仁爱与和平的、完美的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构建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具有毋庸置疑的借鉴意义甚至指导意义。二是认为天下秩序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完美地在历史上行之有效、一以贯之。这些倾向可以说是一种基于需要而对历史进行的误读。在人声鼎沸的讨论中，也有一些冷静的观察。比如，意识到天下秩序在历朝历代的表现上存在差异及多样化特征⁵，或者直接对天下秩序的倡导者的目的提出疑问。⁶

如果非得用一个概念表达传统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世界秩序”（事实上是东亚秩序，但是存在一种超越东亚的世界性的想象），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确实可以被称为“天下秩序”。⁷然而，由于天下秩序之力量结构层面的流动性（非同心圆结构）、朝贡制度存在复杂的变化、以夷变夏的合法性等原因⁸，它更多的是一种与周边政治行为体达成共识的国际公共产品。许多天下秩序的倡导者与批评者在分析天下秩序的时候存在主观臆想，其中交织着对过去的误读和对未来的焦虑。⁹当代中国力图运用历史经验重建世界秩序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除了现实政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天下秩序在历史上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地行之有效、一以贯之。本文基于历史分析，从中国王朝身份的一般讨论和天下秩序的结构层面，对中国是否在传统上是一个帝国、中国的世界秩序在实践上是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进行了反思。

2 被误读的天下秩序

帝国迷思

称传统中国为“中华帝国”：对中国王朝的误读

用帝国概念解读天下秩序的主体（中国王朝）是走错了路数，无论是英文的“empire”还是古汉语的“帝国”，用来称呼中国王朝都是误称（misnomer）。比如，由于清朝的多民族共建的特殊性和庞大的地域特征，新清史学者将清朝与英帝国进行对比研究，把欧洲帝国的历史理论用于解读清朝的性质，认为清朝的帝国构建具有亚洲内陆帝国特色，清帝国和英帝国“各怀有天下情结”，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权想象”。¹⁰或者认为清王朝具有“殖民主义”特征而认为清朝中国是帝国。¹¹

中国的研究者也常将天下秩序称为帝国秩序。比较典型的一种观点将“中华帝国秩序”与“罗马帝国秩序”和“阿拉伯帝国秩序”并列，认为它们存在共同特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帝国中心为统治的圆心；等级制的权力支配体系；强制性的强权统治。¹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很早就开始称中国王朝为帝国。¹³近代以来相当多的外文著作称中国为帝国（Imperial China 或 the Chinese Empire），略见表 1-1：

表 1-1 称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英文书目略表

著者	书名	出版社及年代	简介
J. Francis Davis	<i>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i>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6	第二任港督介绍中国的著作。

续表

著者	书名	出版社及年代	简介
R. Evariste Huc	<i>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i>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Franklin Square, 1855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游历了新疆、中亚、西藏等地,形成此书,引起内亚研究的兴趣。
H. Ballou Morse	<i>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i>	London: Longmans, 1910	马士的著作是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开山之作。
Rene Grousset	<i>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i> (本书法文原版标题是 <i>Histoire de la Chine</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3	法兰西学院院士格鲁塞的中国史研究侧重文艺。英文版将书名加上了“帝国”一词。
Kuhn, P. A.	<i>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imperial Chin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0	孔飞力研究晚清社会变化的力作。
Derk Bodde, C. Morris	<i>Law Inimperial China</i>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3	两位美国教授对清朝中晚期中国法律及社会的研究。
Clark Wor- swick	<i>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i>	Pennwick Publishing, Inc., 1978	早期来华摄影师的部分作品。
Robert Bickers	<i>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i>	Penguin Books Ltd, 2004	毕克思虚构一个来上海做巡捕的英国人,却以历史学家的考证功夫通过主人公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上海生活。
William T. Rowe	<i>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i>	Belknap Press, 2012	罗威廉的著作被形容成近半个世纪西方研究清史的集大成之作,清晰地表达了他认为中国清朝是多民族普世帝国的概念。

续表

著者	书名	出版社及年代	简介
P. Gue Zarrow	<i>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i>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2012	该书是沙培德研究近代中国族群、认同与国家的重要著作。
Maya Mishra	<i>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i>	Penguin, 2013	印度作家米舍尔在书中以中国的梁启超、印度的泰戈尔、伊斯兰哲学家阿富汗尼等现代亚洲知识分子为例，讲述一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亚洲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国家寻求出路的故事。

尽管欧洲的帝国概念不同于中国的帝国概念，但是英文著作者更愿意用人们熟知的“帝国”概念来描述中国统一王朝庞大的政治实体。¹⁴

钱穆认为派驻总督才可以被称为帝国，清代像西方的帝国，因为有藩属，但“细辨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因此不要随便使用帝国概念描述中国：“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至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¹⁵王尔敏指出：中国同化四夷“不是设重兵置总督……虽然没有发展出外交部，却也没有转变为殖民部”，中国只把天下的人分成“教化与无教化二种”。¹⁶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权威堀敏一认为：

古代中国（比如隋唐）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征服和强制而片面强加于人的。……不同于主要依靠征服而建立的罗马世界帝国。”¹⁷

中国王朝无需推行殖民，周边国家和民族从中国王朝的特殊的 world 秩序中得到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好处。它们的统治者需要强大的中国在政治上支持其国内的统治地位，而朝贡者得到的实际利益通常大于其所付出的贡礼，并且还能得到边境互市的恩赐。“天子守在四夷”的理念从不驱策中国皇帝在这些朝贡地区征税或派总督——而这正是欧洲帝国经典的治理方式。请求进一步归化成为中国之一部分却被中国拒绝的情况也有发生。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苏禄国王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倾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毋庸复行赍送图册。”¹⁸

因此，天下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而具有非排他性却有竞争性的产品成为“共用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¹⁹天下秩序不具有排他性，并且在古代的国际关系中具有相当的竞争性，这种公共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共用资源。

中国也曾有过“中华帝国”的梦想。1915年12月，各省“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²⁰，虽然建“中华帝国”最终成为闹剧，然而有帝国梦想者并非袁世凯及筹安会数人。成为帝国的梦想恰恰说明近代中国一些人希望向欧洲的帝国形态靠拢，也说明了传统王朝的天下秩序并不等同于帝国秩序。

西方语境中的帝国

西方语境中的帝国几乎等同于一种国际体系：“在人类绝大部

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²¹但是，帝国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欧洲的帝国具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具有强大的超越一般国家的力量去兼并他国或占有殖民地；二是元首称帝。在广义上，一切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都可以被形容为帝国，因为帝国概念具有文学性描写特征，也具有表达某种雄心壮志的用途，有时没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也自称帝国。²²从意识形态上而言，帝国一词早已失去其古朴的含义，暗含了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意义。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皇帝和帝国当然是古老的，但帝国主义却是相当新颖的。”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一词“突然变成一般用语”，他借用一位英国自由党员的话说：“（它已）挂在每个人嘴上，用以表示当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运动。”²³古老帝国的辉煌与荣耀被19世纪末人们对帝国扩张的恐惧取代。

传统帝国秩序依托于一国的独大，以一国之政治诉求为世界秩序的全部原则，但是中国统一王朝时期的天下秩序与罗马帝国或不列颠帝国的世界秩序存在诸多差异，一方面，中国王朝在性质上并非等同于欧洲帝国；²⁴另一方面，天下秩序是行为体互动博弈达成的共识，并非殖民主义政策的结果。那种借用欧洲“Pax Romana”“Pax Britannica”的概念创造“Pax Sinica”（中华帝国治下的和平）概念的做法²⁵，是言过其实的。

帝国战德：想象中的天下一统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更多的是文化一统，政治统一的时间事实上短于分裂时间²⁶，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大一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现象和文化心理诉求。

大一统梦想在清朝之实现在于清朝的确成功整合了曾经对中原王朝构成两千年威胁的内陆边缘地带，当大一统梦想在清朝处于实际实现的历史最高阶段的时候，中国的多民族共治的认同已经使王朝的统治者自认为实现了传统中国统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标即“德化天下”²⁷。

古文中的“帝国”代表了中华思想追求的德化天下的高级阶段即“帝国战德”。隋代王通论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²⁸“帝国”在这里的确切含义，是指中国上古时期以道德仁义立国的理想国家。西方的帝国类似王通所论之强国与霸国，在道义上远低于中国语境中的帝国。“帝国战德”即：“上古三皇五帝之国以道德取胜”，这是一种非常古朴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帝国”之意可以从如下典籍中找到脉络：《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阮籍《通老论》中的“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²⁹。

近代以来中文的帝国概念来自中国对欧洲历史的解读。比较早的将“Empire”翻译成“帝国”的是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严复将“Empire”音译为“英拜尔”：“夫希腊……若波斯……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一变局也。”严复在注释中解释：“又，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王皆称帝者也。”³⁰严复没有将中国列